

## 第五章 「閱讀」上海

### 第一節 感懷傷逝的文化記憶

文學作品中關於城市記憶的構築與再現，牽涉了敘述主體對於記憶選擇的認同與召喚過程，因此選擇了那些記憶？為何如此選擇？以及如何呈現？這些問題皆可照察出作者在創作中所回應的個人城市經驗和生活。陳丹燕筆下所詮釋的上海文化特色，充滿了思索和追尋的風格，在其上海書寫作品中，不時可見到西方城市鏡像中的上海。例如她在《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法國城》裡道：

像英國一樣有那種來歷不明的霧，或者紐約天陰起來像一大塊鐵，上海也是一個陽光不多的城市，常常是灰色的。這條武康路，像一只灰色的襪子一樣。那裡，你可以看到另一些西式的房子，小小的、突出的鑄鐵陽台上，攀滿了微微發紅的長春藤，帶著真正古老的歐洲情調，江河日下的精緻。它又有一種遠在東方的奇異氣氛：陳舊、隱密和被遺棄的東方式的多愁善感，這是歐洲那些被精心保護的老房子所無法表達的。<sup>1</sup>

瀰漫著新舊時代氣息的上海，相近又相異於西方國家的城市文化，常令人眩惑不已。這座具有懾人魔力的上海城之所以如此獨特，泰半源於其半殖民地的色彩，以及現代文明和古老生活方式兩者奇異的連結，導致上海成爲一座充滿矛盾的城市<sup>2</sup>。所謂「江河日下的精緻」或「陳舊、隱密和被遺棄的東方式的多愁善感」，都帶了一種感懷傷逝的沉鬱氣息，昔日的上海輝煌在歷經內外戰亂與文革紅旗烈焰的肆虐後，也不得不敷染上一層滄桑氣息。陳丹燕在文中對於上海文化的興趣

<sup>1</sup>陳丹燕：《上海的風花雪月》（台北：爾雅，1999），頁 114。

<sup>2</sup>參見朱華等著：《上海一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28-29。

和描寫，不著重於過往歷史中那烽火動盪、涕淚飄零的時代氛圍，而是一種混合著感傷和惆悵的城市風華敘寫。又如書寫上海外灘的迷人景致：

晚上到外灘去，能看到沿著江面的從前黯淡的大樓群，如今被新裝上的照明燈照得雪亮。一百多年以前的歐洲大樓，巴洛克式的，青春藝術式的，芝加哥式的，羅馬式的，幾經滄桑而不毀，在上海發紅的夜空下默默佇立，帶著一種好像是哀傷的氣息，即使是被照明燈照得像一根根透明的棒冰一樣的夜晚，也不能揮去這樣的氣息。它總是要讓人想像。<sup>3</sup>

上海這座世人眼中的華麗之城，在陳丹燕筆下總是敷染了一層揮之不去的惆悵與哀傷，她在新舊時代、東 / 西方的時代對比中，展開了關於上海建築、事件與記憶的追尋。靜默在上海外灘的西式大樓建築，不論是「巴洛克式」、「芝加哥式」、還是「羅馬式」，都訴說著上海過往的半殖民地色彩印記，陳丹燕相當擅長刻劃上海在中國所有城市裡那獨一無二的歐陸情調和文化風尚，她對兼蓄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上海可謂流露出豐沛的情感。

當代大量出版的上海懷舊圖片和文集，體現了想像與再現舊上海熱潮下，現代人留戀與珍視過往一去不復返時光的情感需求<sup>4</sup>，一座城市所積澱的文化符碼代表著許多不同的特定意象，也因如此我們才能多方照見豐富的城市圖像。而城市書寫所展示出的作者個人都市經驗，通常兼具了「結構性總體感受」之外的多樣性與紛雜性<sup>5</sup>，尤其在全球化文化語境中，現代社會所帶來的快速變動和疏離

---

<sup>3</sup>同註 1，頁 128。

<sup>4</sup> 趙靜蓉說：「懷舊總被想像成一種不言而喻的感覺，它是某種朦朧曖昧的、有關過去和家園的審美情愫，不僅象徵了人類對那些美好的，但卻一去不復返的過往的珍視和留戀，還暗含了人類的某種情感需求和精神衝動。」參見趙靜蓉：〈懷舊文化事件的社會學分析〉《社會學研究》第 3 期(2005 年)。

<sup>5</sup> 王志弘說：「城市以其複雜多樣，激發了更強烈的探求全貌的欲求，另一方面，城市也正以其無所不包，而成爲構想整個人類世界的模型，成爲全貌之縮影……都市的經驗與記憶，在每個時

衝突的生活體驗，也開啓了人們多重視點的討論。例如陳丹燕對於上海在九十年代以降巨大蛻變的體悟：

上海經濟開始快速起飛，上海成為全球關注的爆炸式發展都市……「與國際接軌」成為那幾年時髦的語言。接上了軌道，人們隆隆地向前駛去，就像島上的居民踏上難得一去的寬闊大陸的感覺一樣，突然會發現前景是那麼開闊，那麼紛繁美麗，簡直要讓人不得不很快地忘記最初逃離島嶼時使用的那些老吊橋，它們長年被吊起在半空，曬得發白，長著發黃的鐵鏽，像是百無一用的怪物。當踩著它們吱吱作響地往前走的時候，也並不真能確認它們就真的有用，就真的會領著人們去到開闊的地方。<sup>6</sup>

在當年最艱困的時局裡，那一波接一波的皇皇大軍渴望離開中國的記憶早已被現代上海人淡忘，甚至選擇以失憶的方式來面對過往的歷史。文中「最初逃離島嶼時使用的那些老吊橋，它們長年被吊起在半空，曬得發白，長著發黃的鐵鏽，像是百無一用的怪物」，實展現出作者超越城市實體空間景觀的深沉感受，雖然當初用來逃離島嶼所建造的老吊橋如今依然默默地存在著，但在歷史機緣的牽引轉變下，人事已非的事實的確令人感慨。又如書中描寫歐式風格濃郁的上海愛爾蘭酒館：

十九世紀初年，來上海的歐洲人在東大名路上開出第一家歐洲式的酒館，此後一百年，是上海門戶洞開的時代，最多時，在上海有十二萬常住戶口的外國人。他們給上海帶來了電話、汽車、染料、貿易、香水、玻璃絲襪、

---

代一向是以其多樣性為根源。但是在工業化進行之際，都市的急劇擴張，為這種複雜多樣帶來了新的尺度，新的強度和節奏。快速繁複的變化，使得感官所接受到景象和訊息，成為片段化、流轉不居的拼貼。此時全貌就顯得更難猜想掌握了。所以，都市經驗一方面是身陷一種結構性的總體感受，一方面又是支離破碎，難以分類的紛雜。」參見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16。

<sup>6</sup>參見陳丹燕：《上海的金枝玉葉》（台北：爾雅，1999），頁240-241。

機器、鴉片、咖啡、沙發、照相機和柯達膠卷以及陸陸續續的整個西方文明，還有灑著血污淚水的通向世界之路，一百餘年過去，當中經過三十多年中國人對在上海的外國人徹底的清洗，當年東大名路靠近碼頭的那家酒店早已不知去向，現在在靠近領事館區的桃江路的街角，又開了在歐洲流行的愛爾蘭酒館，為現在到上海謀生的六萬外國人在遠離家鄉的夜晚有個像家一樣的地方可去，去忘記自己到底是在那裡。<sup>7</sup>

不論是早期來上海闖蕩天下的西方人，還是深受全球化思潮影響的現代上海人，無不體現出對於自身文化身份和地域認同意識的漂流不定感。陳丹燕在書寫上海的城市記憶時，於惆悵感傷的筆觸下常常流露出嚴肅的思考，即因有「灑著血污淚水通向世界之路」的歷史創傷經驗，才造就現今世人眼中璀璨耀眼的上海。不可置否的，現代人對於都市景觀的快速變遷，以及空間型態的巨大改變，通常有股對既有記憶模糊化後的無所適從，誠如廖炳惠所言：

在都市文化研究和人文地理學的範疇中，「記憶」的探究則經常伴隨著都市景觀的迅速變化。人們的「記憶」在公共空間的快速取代中不得被迫失憶，無法透過固定的地標、景觀和空間想像來固著既有的記憶，這種歷史與過往記憶的失憶癥候，不僅會造成深沉的憂鬱和失落，更會使人無法找到藉以固錨的定位點。<sup>8</sup>

對現代人而言，不論是個人情感還是集體記憶，都體現出矛盾尷尬的「失憶癥候」現象，而這種「無法固錨的定位點」也正是陳丹燕在書寫上海文化記憶時著力甚深之處。華洋雜處、古老與摩登、傳統與現代等不同文化相容的都市內涵，皆造就了上海獨特的城市性格，尤其鮮明的西化特點更是衝擊著原來舊有的傳統文化

---

<sup>7</sup>同註 1，頁 27。

<sup>8</sup>參見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彙編》（台北：麥田，2003），頁 165。

結構：

近代中國被描述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它與西方的關係是極為複雜的。這裡雖然沒有發生殖民地式的宗主國與從屬國的關係，但是在文化上西方對中國構成的強大壓力是顯而易見的。<sup>9</sup>

近代中國與西方國家間錯綜複雜的衝突磨合過程，一直是上海進步與發展的推動力，陳丹燕在其創作中鎖定上海中西混血文化的特質，進而描繪出她心中的城市文化內涵，在古往今來不同的歷史文化對比、辯證中，具現了感懷傷逝的惆悵敘述色彩。當三十年代的上海在今日已成為被不斷想像和消費的客體時，陳丹燕所書寫、思索和凝視的上海，不是舊時代男歡女愛的風月情事，也不是戲夢人生的老上海情調，而是上海那錯綜複雜又定位不明的城市發展史。



---

<sup>9</sup> 參見陳曉明主編：《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昆明：雲南人民，2003），頁 10。

## 第二節 新時代裡的舊靈魂

陳丹燕在「閱讀」上海的城市命運發展史時，會特別去關注一群從舊時代過渡到新社會生活的老上海人。在〈白髮蒼蒼的即時行樂〉這篇散文裡，她訪談了一群定期在上海紅寶石麵包坊聚會的老上海人，他們往昔皆是受過良好西式教育的高等知識份子，在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後那動盪不安、劍拔弩張的混亂時代，他們並沒有飄洋過海地遠走他鄉，但留在中國的日子卻是他們在走過大半生後極不願意再去回想的記憶，對於當初是否後悔留在上海的決定，他們悠然地說：「我們老了，不願意思，也不願意說過去的事了，開心的，不開心的，都不要再想起。現在我們就要安安定定，星期可以到這裡和老朋友碰碰頭，吃吃咖啡，說說話，解解厭氣，就可以了。」<sup>10</sup>過往的記憶對這群老上海人而言，宛若止血後的傷口，雖已逐漸復原結痂，但在他們壓抑的心中仍然留下一道隱痛。現在生活衣食無缺的他們住在昔日法租界的舊洋房裡，於體面的外在裝扮和淡默的神情下，混合了一種類似前朝遺老的無奈身姿，此種舊靈魂的氣息在在銘刻了其曾在時代夾縫中生存的印記。又如住在華亭路上西洋小樓房的徐姓中年男子，他靠著租界時代祖上積蓄過活，並在陳舊的花園洋房裡編織著對舊上海時代氛圍的想像：

他穿著質地和人工都不算精良的衣服，他身上的布幔不知為什麼要遮起來，隔著昏暗中似乎堆放著一些舊物的沒開燈的走廊，他彷彿是一個在後台候場的演員，台前熱熱鬧鬧地演出著租借時代的故事，而他卻被時代阻隔，永遠候不到上場的機會了。伴隨著這些房子、這個園子的漸次老舊，他已經度過自己的大半生。他不能夠容忍賣掉或者租掉無法整修的大園子和無法住人的舊屋子，同時又無法鞭策自己進入社會胼手胝足賺錢發財，他住在舊屋子裡，幻想著有一天去看一看做德國買辦的祖上遺留下來的無

---

<sup>10</sup>同註 1，頁 56。

限親近和崇敬的德國。<sup>11</sup>

雖然上海租借時代早已遠去，舊時代驚心動魄與轟轟烈烈的戲碼也謝幕散場了，但作為昔日德國買辦後代的徐先生仍不時地遙想、緬懷十里洋場的過往風華，文中以癡盼登台的候場演員來比擬他執著貪戀逝去的舊上海歲月，實精準地捕捉到這群處於新舊世代夾縫裡上海人的幽微心緒。陳丹燕的寫作路數即是針對特定的上海文化階層，穿透了他們表面上繁華絢麗的外衣和面具，深入領會出這群老上海人隨著經歷滄海桑田的城市變遷，以及從舊時代過度至新社會的黯然落寞。

在《慢船去中國：范妮》中，陳丹燕也相當敏銳的描繪出在上海新式里弄中成長的年輕一代，例如范妮的自恃和脆弱：

她對里弄裡的生活，蚊香的氣味，還有那裡的人世故的態度，抱著熨貼的感情。美國罐頭就是一個新式里弄裡出來的人，中學裡的班主任也是新式里弄裡出來的人，甚至家裡的鋼琴，也是捐給了一家開在新式里弄裡的幼稚園。和這樣的人相處，范妮才真正得到過愛惜。要是沒有在新式里弄裡活生生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范妮認為自己就不會有優越和清高。<sup>12</sup>

以及范妮滿腔熱血地逃離中國到美國生活後，所遭遇的一連串心理挫敗和猝不及防的信念崩塌：

她想到，自己是這樣由衷地喜歡著西洋，熱愛著英文，千山萬水，千辛萬苦地投奔這裡，以為終於走到了，但卻是越來越遠。連原來堅信自己擁有

---

<sup>11</sup>同註 1，頁 148。

<sup>12</sup>參見陳丹燕：《慢船去中國：范妮》（台北：印刻，2004），頁 232-233。

的，現在也變成不是自己的了。<sup>13</sup>

這群在中國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上海人，具有自視甚高、敏感脆弱與崇尚西方的性格特點，他們的驕傲來自於良好的家庭背景；而他們的自卑卻是因對母國文化認同的擺盪。尤其他們通常對現代社會適應不良，也對中國文化傳統無所適從，雖然內心有著諸多的不滿和怨言，但卻始終對上海抱持著「熨貼的感情」，此種難解的矛盾情結即是現代上海人在新 / 舊時代、東 / 西文化相互拉扯下的結果。又如小說中描寫范妮和其友人美國罐頭對舊上海氣息的迷戀：

他們都喜歡夜晚的上海馬路，喜歡看夜色裡顯得不那麼破舊的老洋房，喜歡聞到荒蕪的院落在夜霧下散發出雜草香氣，喜歡猜想那些房子裡過去的人與事，那都是在他們出生前就發生並且湮滅了的往事。他們喜歡把玩那種沒落。<sup>14</sup>

因為無緣經歷，所以對一去不復返的舊上海意象存著無邊的想像與情有獨鍾，而盡情徜徉在把玩沒落上海的時光裡，也撫慰了他們驕傲又易碎的自尊。陳丹燕的上海作品，很明顯是聚焦於成長於新式里弄或花園洋房的現代上海人，此階層的人物群像通常擺盪於東西方的價值觀，並常陷於對自身文化根源被迫割裂的泥濘裡，他們半新不舊、游移徬徨，且對上海的文化和地域認同皆充滿著不確定感，在他們的身上著實映現了上海在中國歷史身世上無法明確定位的窘境。

在上海女作家的作品比較中，有論者認為張愛玲和王安憶的上海書寫著眼於人間世情，不同的是張愛玲善於刻劃亂世中傳奇性的人事物；而王安憶側重挖掘

---

<sup>13</sup>同註 12，頁 110。

<sup>14</sup>同註 12，頁 92。



上海尋常平凡的市井風情，風格既質樸又堅實。<sup>15</sup>再者，另一位受到文壇矚目的女作家虹影，則是向來擅長描摹人性的情慾與逼視殘酷的人間苦難，她的《上海之死》即是描寫上海租界在孤島時期那諜影幢幢、危機四伏的時代氛圍，通篇小說瀰漫著鬥狠角力與的故事張力；另外《上海王》則選擇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物來講述近代起伏迭宕的上海灘故事，此種危疑叛逆的寫作路數與取材視角，著實與陳丹燕的感性溫情觀照視野有所區隔。對於出身小康家庭的陳丹燕來說，長年旅行歐洲的域外經驗，以及兼具東西方不同文化養成的教育背景，讓其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深具都市中產階級的生活趣味。雖然陳丹燕的上海書寫風格偏向唯美雅致，不過她在掌握與刻劃新舊時代交替過渡下上海人的掙扎、不安與失措，實有著相當細密入微的功力，在文學創作中也挖掘出以往較少被人注意的上海人文風貌。



---

<sup>15</sup> 參見謝怡、吳隱林：〈張愛玲與王安憶上海書寫比較研究〉，《廣西社會科學》3期(2007年)。